从辩证的视角看中医科学性问题争论

陶嘉磊  张宗明  汪受传

摘要：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其科学性争论的长期存在有其历史渊源，争论存在具有普遍性。科学定义界限不清、民族自卑感的影响、中西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及中医被歪曲利用等因素，是中医科学性问题争论存在的原因和内在本质。中医拥有自身的科学性，但其按照西学的科学理念进行自身的科学性研究和申辩，致使中医逐渐偏离了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出现了中医学的临床、科研的混乱。中医应该看清现实，不必在科学性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如何继承、如何大力发展真正的中医才是当前要注重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中医，辩证观，科学性

中医学吸取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以“阴阳五行”学说、“干支运气”理论为框架，将“天人相应”“整体观和矛盾辨证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案例的观察和归纳总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生态医学。马伯英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写道：“中医学是临床理论、治疗及预防的科学。”并认为，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然而，近百年来，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持续存在，不时成为国内外民众争论的热点，在国外日臻欢迎的中医，在国内却像一只未安罗盘的船。对于新事物而言，争论的存在常常是其发展、自我完善所必须经历的。而拥有几千年历史、为中华民族卫生保健和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医，其所谓的“科学性”仍然饱受争论，甚至有“废止”、“不可救药”之说。本文从论证的视角对中医科学性的争论进行分析，厘清争论来源，分析其原因与本质及其价值。

1 中医科学性问题争论的渊源

“科学”一词在中国是舶来品。原词源于希腊，中译名则是从日本而来。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一词，因此，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也就不存不存在关于中医科学性争论。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一词首次由陈独秀等人以“赛先生”引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更高的社会文化地位[2]。诚如胡适所言：“这30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理解不清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3]。”“科学”一词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强势的概念。在普通民众眼里，科学的就是先进的。如此一来，导致全国上下一味的崇尚，到底有无价值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彼时，西医的强势便引了对中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又因为中西医本身体系不同、时代局限性及利益关系等因素，中西医之争才成事实。站在理念的制高点，西医批驳中医不科学，而中医想要在与西方医学之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遵循所谓的科学的游戏规则，先证明其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医科学性辩成为中医同仁们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甚至于中医的存废相关[4]。正是因为中医不明智而又不得已的退让，按照所谓的“科学的游戏规则”——西方医学的理念进行申辩，为之后长达百年的争论埋下伏笔，也为中医的自我迷失、徘徊和迷惘种下苦果。

2 近百年中医科学性问题争论的状况

民国时期及建国初期，中医科学性问题争论几乎送了中医的前程，使中医元气大伤[5]。一是在民国初
年，教育系统想不声不响地将中医从教学体制中剔除。1914年，中医界余伯陶等人联合了19个省（市）的中医人士，提出废除医药教育请愿书，要求废除中医教育，最终中医办校被“束之高阁”，中医办校自此自灭。二是1929年，在国民政府首脑中央卫生委员会长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的提案，竟获得通过。全国中医界人士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多次上书代表到南京向政府请愿，把3月17日作为“国医节”，最终保住了中医，但仍然无话语权。三是20世纪50年代，在东北地区有废除中医的倾向，而被中央政府及时制止。

改革开放以后，以针灸为先导的中医药技术逐渐走向了世界，而国内仍有一些人主张“废医存药”，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与当今科学不符合，不应再予以保留，并主张全面运用现代科学知识，重构中医理论，将中医治疗疾病的机理，更有人认为，中药的疗效可能被夸大，应当“废医验药”，要严格地检验中药疗效是否客观可靠。

近十年来，关于中医科学性的争论，似乎步入了一个怪圈。只要是关于中医的事件，无论正面的报道还是负面报道，中医科学性问题总会被提及，甚至被推到风口浪尖，中医本身也造成了不小的反响。如“绿豆事件”、张悟本事件等。然而，这个好消息传至国内时，竟引起了一些截然相反的反应。围绕这一事件，其本质还是关于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前一段时间，由烧伤超人阿宝发起的“中医号脉验孕”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仅在新浪微博上，微博话题“西医战胜中医”，几天的阅读次数达3000多万，微博讨论近4万条。而中医科学性争论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然而，在中医界，这波事件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反应也越来越淡定了。

3 中医科学性问题争论的原因

3.1 争论存在的普遍性

从哲学的角度讲，争论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普遍性。矛盾存在于贯穿于每个事物发展的始终，我们应当持对立矛盾的观念，辩证地看待争论，要坚持用两分法看待问题，要善于全面地分析争论存在的合理性。中医不是万能的，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会被他人利用，成为被质疑否定的把柄。中医科学性争论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相应的历史渊源，是可以被理解的，从辩证的角度看争议的存在是必要的。

3.2 科学定义不清

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最先提出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非科学划分的见解，他们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可被证实的，才是科学的，强调一切科学的知识必然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的经验事实上。其20世纪初，波普尔认为，无论是证伪或是证实，都无法将科学与非科学绝对分开。因此，哲学家们都认为科学的界定自然而然也应是科学共同体一起遵守的“范式”。基于是库恩的理论，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科学是能够预见不可思议新事实的理论。

从以上关于科学的讨论可以看出，科学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狭义的科学，可被认为是一种接近于真理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必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如果把科学作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把科学与真理同等看待无疑是进入了误区[3]。

3.3 民族自卑感

当中国被列强欺凌，民众陷于水火之中时，国民开始反思，怀疑自己此时所拥有的一切事物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全盘否定曾经为民族繁衍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些技艺。在普通民众的眼里，西方的都是科学的，而真正发源于中国的多与封建落后相关，都是不科学的。在本质上，这是民族自卑感的体现，而民族自豪感的重建，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如国家真正的富强，民众能够切实享受生活等，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认为“中医是旧文化”，本质上是对中医的无知，是对医学发展趋势的无知。在有些人眼中，青蒿素是中医药的遮羞布，中医药似乎是多余的，而从中药新药研究开发角度看，中药自身创新的产品甚少，更多的是仿制品，而且许多药物的临床疗效也与国外有相当差距，这才是真正令人羞耻的。然而，民族自卑感导致人们普遍轻视、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药，从全国中西医医生的人数以及中医医院和西医医院发展情况来看，中医药日渐式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7]。

3.4 思维文化因素

西方人喜欢直观，其“直线性推进式”的思维更直观，易被受现代教育的人认可接受，而东方文化中更多地强调委婉。随着西方文化不断传入，现代人受教育方式也逐渐改变，对传统医学产生怀疑也就不可避免。从当下的“反医”人士的文化背景看，大多数人都是接受过“以物为认识论中心”的西式教育，受自然科学影响至深，对中医的质疑也就成了必然。

与中医基于中国文化，探讨世界的统一性，迂回的“模型思维”不同，西医主要是在“原型思维”下发展起来的[8]，缺乏包容理念。对于无法理解甚至有悖于西医理念的中医理论，西医是绝对的排斥并充满敌意的，以致希望中医尽早废除。而另一方面，这本质上反映的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或许再过百年，此观念会有巨大改变，因为就目前的状况看，西医已经到了瓶颈期，其发展已
举步维艰，已经有了向中医理念学习借鉴的趋势。

3.5 中医自身因素

首先，随着近代科技突飞猛进，西医学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中医则长期处于停滞、缓慢倒退的状态，这与中医自身关系密切。中医理论本质上都是哲学的范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没有统一标准，以至于目前机体内外无法找到某种物质或某类物质与其对应。以“气”为例，有呼吸之气、人的能量、人体组织液的流动等概念，但仍然无法了解，甚至常为“气”的全貌。其次，由于中医具有生态医学动态性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可重复性。中医的动态性及其如前知识般不断更新，如张仲景似神明般预知疾病之生死。《内经》中对人体生命规律的精辟论述，以及两千年后运用中医“五运六气”理论测算“非常”等，这些反而增加了中医的玄幻性。最后，大量的循环论证存在于中医理论中，中医往往能够自圆其说。任何规定范围外的事物都可通过调整、拓宽自己理论的形式来适应，如通过拓展外感六淫、疫气的邪气的概念与近代疾病原生物相应适应，临床疗效之有效、无效更可以用辨证论治“一言以蔽之”；疗效差的可以认为是没有辨证准的。以上内容偏离了西医“科学”的标准，常被作为攻击中医的把柄，使中医常常被人诟病。

3.6 中医被歪曲利用

中医被曲解利用也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因素。各种为谋一己之私利的人以中医的名义，或在医学难题面前，利用中医扩大其效能，反而使中医药被妖化，损害了中医的声誉。他们赋予自己某种自制的头衔，诸如“国家名医”、“抗病协会主席”等，如使用芒硝就能救急症于顷刻的“载世华佗”胡万林。由于对医学缺乏了解，许多患者成了江湖骗子坑害的对象。

4 辩证地看待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中医的科学性，而是在于中医的科学性，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科学性问题，而是有其复杂性。首先，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涉及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临床实践、教育方法等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次，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涉及到中医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医理论是中医实践的基础，而中医实践是中医理论的检验。再次，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涉及到中医的现代化问题，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科学性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其复杂性，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医的现代化进程。